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黄爱平
吴杰
编

唐方
东
鉴树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黄爱平
吴杰
编

唐方
东
鉴树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方东树唐鉴卷/黄爱平, 吴杰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456-7

I. ①中… II. ①黄…②吴…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方东树(1772~1851)-思想评论③唐鉴(1778~186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29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方东树 唐鉴卷

黄爱平 吴杰 编

Fang Dongshu Tang Ji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40.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51 000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方东树、唐鉴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其生平际遇虽有所不同，学术造诣亦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多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步入近代之时，两人各有一部著述风靡一时，轰动天下，这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二者都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职此之故，因将两人重要著述合编为一卷。以下分别述之。

—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因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五十知非”，卫国国君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①，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方东树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泽，字苧川，晚自号待庐，乾隆十二年（1747）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主讲山西洪洞玉峰书院。能诗擅文，论学尊崇朱熹，论文崇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训，字味书，未入仕。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承桐城派大家刘大槐、姚鼐之学，力倡古文词，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

受家族和家学的影响，方东树自幼向学，即喜为古文词，并显示出

^① 参见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很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他仿效南朝齐、梁间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得到乡里前辈叹赏。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范围日益广泛，兴趣也有所转移。据其自言：“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恍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盭，为不当意”^①。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22岁，他与父亲方绩同拜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家姚鼐为师，受业于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在姚门诸弟子中，方东树不仅“随侍讲席最久”^②，而且以其杰出的诗文才华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学术趋向，深得姚鼐器重，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

在拜师姚鼐的同年，方东树亦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生。与所有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方东树也期冀走上读书做官、学以致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十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乡试，一次应考岁试，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年届57岁，始绝意仕途，不再应试。

科举多次受挫，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参赞幕府。他先后馆于江西新城陈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志伊尚书府邸，又辗转于安徽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并应姚鼐之邀，长期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其间还曾应江宁知府吕燕昭之请，参与纂修《江宁府志》。虽常年往来奔走，不遑宁处，但收入却极为微薄，方东树常常陷入衣食无着的窘境。诚如其自言：“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羁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③嘉庆二十四年（1819），48岁的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请赴广州，参与纂修《广东通志》。此后数年，除短暂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协纂书籍，或教授经学。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遂自粤归里。其后，又先后主持安徽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泃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佐理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客居武进县令姚莹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广东参赞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次年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请，参与纂修《粤海关志》。道光二十年

①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

②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八年条。

③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

(1840) 归里，授徒论学，培养人才。桐城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文汉光、甘绍盘、郑福照等十余人均出其门下，各有所成。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闻》等书凡十多种，并自编其文集、诗集。虽然生活依然艰困，但方东树甘之如饴，著述授徒，“益穷性命之归”^①。唯对自己当年因漂泊在外，生计窘迫，未能归家为其父亲奔丧一事耿耿于怀，“誓宜没于外以自罚”^②。咸丰元年（1851），当新任安徽祁门县令唐治邀请他前去主持东山书院时，方东树不顾年高体弱，执意前往。未及数月，即因病卒于当地，享年 80 岁。

尽管终其一生，方东树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始终坚持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尝言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③。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发生水灾，县令杨大缙不但不加抚恤，反而一味贪赃婪索，导致民怨沸腾。而当地官府竟以民变上疏安徽巡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当时方东树正客居邓廷桢幕府，闻讯后立即面见邓廷桢，详陈实际情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请求罢兵，终于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涂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东树因参赞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客居广州，目睹鸦片流毒天下，祸害百姓。他忧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渐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④。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提出：“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⑤ 又作《劝戒食鸦片文》，痛陈鸦片之害，力劝食者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方东树虽然已因年老归乡居家，但仍心系国事。当他得知朝廷将帅面对英军进逼大多退守避让，不战而逃，东南数省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兵燹之祸时，极为痛心疾首。他不顾衰病在身，伏案疾书，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纵横捭阖，鉴古论今，提出收服汉奸，申严军法，增修武备，禁断贸易等制敌之策，认为

①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

②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

③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

④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劝戒食鸦片文》。

⑤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化民正俗对》。

“谋国之道，不恃敌之不攻，惟恃我之不败。今日之事，及逆夷暂退，急须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只要“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①。道光三十年（1850），方东树已家居10年之久，年届79岁高龄，但当他读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②，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当年。诚如其弟子苏惇元所言，方东树一生，“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③，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

当然，方东树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恪守程朱理学、捍卫儒学道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尊崇朱子之学，历来是桐城方氏家族的传统，方东树也不例外。他“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从姚鼐，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自谓“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故其立身处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学术，裁量人物，无不以朱子为宗，甚而“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④。对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方东树自然深为不满。他曾撰《辨道论》，指责汉学“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刳蔽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⑤。嘉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不仅学术界群趋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而且还出现了为汉学家立传，彰显汉学学术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即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眼见“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弗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

①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病榻罪言》。

②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与魏默深书》。

③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首。

④ 方东树：《书林扬觝》卷下，《序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⑤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辨道论》。

障”，本不欲置辩的方东树再也按捺不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发愤著述，撰成《汉学商兑》三卷。他仿效朱熹当年为批评其他学人学派之说所著《杂学辨》的体例，首先摘录论敌原文，再“各为辨正于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书；所作辨正，“特论其纲领宗旨”；若“援引事类，或推衍余意”，则“以类附注句下”。全书“本止一卷，首尾脉络相贯”，但因篇幅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辟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①

在阐发其书宗旨义例的《序例》中，方东树开篇即列举汉学家攻击宋学的要点所在，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由此出发，方东树旁征博引，反复辩难，对汉学家的思想主张、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集矢于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汉学大家，大段征引其言论观点，逐条予以辩驳，甚至不惜攻击谩骂诋毁之辞。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立说，“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尤为反感，指责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②！不仅如此，方东树还给汉学家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比之于杨、墨、佛、老，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掇。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辟道”^③，“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

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重序》。

③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夫。学士大夫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无噍类矣”。^①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学术宗旨深致不满，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故而 he 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摹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核的学术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② 在他看来，此等学问“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③。故而方东树对汉学诸家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④

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

①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

③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①。可以说，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和攻击，把清初以来或隐或显的汉宋之争推向了一个极端。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考据驳杂细碎，无益国计民生；认为训诂考据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他纯粹从卫道的立场出发，一以程朱理学为衡，门户之见极深，故而其书多充斥愤激之辞、詈骂之语，名为“商兑”，实则攻击，乃至漫骂、诋毁，这不能不说是《汉学商兑》一书的最大缺陷。萧一山也认为：“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专以诋毁经学家为务，而道统之观念更为炽烈，益多主观之论矣。”^②

《汉学商兑》成书后，当时的理学家多有赞誉，如姚莹称：“研究大著，宏博渊通，沉精明辨，息群言之喙，区大道之途。书成一家，义宗百氏，洵斯文之木铎，为正学之明镫。”^③ 沈钦韩谓：“不遍读群书，不足知其援据该洽；不精深穷理，不足知其折衷允当；不能包括古今义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书之蕴。”^④ 甚有称《汉学商兑》之书成，“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⑤ 者。其后，随着晚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风气的转变，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方东树其人其书的肯定，《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影响也越来越大。民国初年，梁启超纵论清代学术，对是书多所认可，他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⑥

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姚莹：《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

④ 沈钦韩：《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

⑤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按：梁启超谓《汉学商兑》“成于嘉庆间”，不确。参见本书《方东树年谱简编》。

但另一方面，对《汉学商兑》一书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乏持否定意见者。有学者认为，该书论据“陈言无力，所以并未起什么作用”^①，也有学者断言：“究其实，汉学衰微与汉宋调和等，与《汉学商兑》并无任何的直接关联。”^② 客观而言，认为《汉学商兑》出而“汉学之气焰始衰”，将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誉为“一种革命事业”，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完全否定汉学衰微与《汉学商兑》一书的关联，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光初年，汉学虽仍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自身弊端日益显露。随着形势的变化，不仅来自外界的批评始终不断，汉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省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汉学商兑》对汉学全方位的批评、攻击乃至诋毁，无疑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汉学的弊病，从而对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钱穆在指出《汉学商兑》一书“专务纠驳”、“肆口无忌”，并将方东树学术造诣与当时学者加以比较之时，也认为该书“惟以纵横排募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③。

方东树恪守程朱理学，也极为重视立身制行。在他看来，“学之本事”在于“修己治人之方”^④，士人“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足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⑤。他一生勤于读书著述，“每日鸡鸣起，至漏数十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虽迫于生计，经常奔走四方，但于“舟车尘土之间，忧戚病患之余”^⑥，仍好学深思，刻苦自励，时时体验“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⑦，凡有所悟，皆随笔条记，积数十年之功，撰成《待定录》百余卷，“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惜其书未刊，后毁于兵燹。晚年家居课徒，方东树亦持身谨严，侃侃不阿，“遇事据理直论，或面折人非”，“凡以诗文就

① 汪绍楹：《校点后记》，见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② 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20、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④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待定录自序》。

⑤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

⑥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

⑦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